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 演进与思考

□ 朱立元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一、40年文艺理论研究的巨大成就

新时期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敢于争鸣,勇于创新,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

文艺学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和办法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样化和逐渐成熟。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观念上从突破禁区开始,努力进行理论创新,逐渐确立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文艺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讨论中,文学要表现什么样的人、人道主义以及如何表现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钱谷融1957提出而屡遭批判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新得到确认。钱谷融强调:“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基础。”在文学领域,“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决定于作家怎样描写人、对待人”。这个思想,被文艺理论界和文艺界广泛接受。这标志着文艺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回归,从而为新时期文艺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另一种违背人性的现象,这突出表现为部分文学创作和欣赏中感官欲望的无度扩张和享乐主义的大肆泛滥,而文艺理论和批评界也有个别人对这样一种倾向从理论上给予支持,这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对作为文艺理论基石的人性论的扭曲和挑战。对这种现象的及时批评,是文艺理论界结合新的实际,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努力的一部分。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界定文学根本性质的新观念,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经过从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变革和改造,

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主流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突破了工具论,回归和突出了长期被忽视的文学的审美本性,揭示出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特殊属性。二是确认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把审美性作为文学基本和唯一特性的形式主义观念划清了界限。三是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应该是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渗透、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构成文学的内在本质。四是突破单纯的认识论(包括能动反映论)文学观,体现了文学的价值论追求,肯定认识性(反映性)与实践性(意志活动)的统一,是文学意识形态性的重要内容。学界也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系统,审美意识形态乃是最基础层次的本质,如有的学者所说,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即使现在看来,“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的确能够比较完整地概括文学深层次的本质特征,并具有较为广泛的包容性和理论涵盖性,能够适应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多元发展的基本态势,因而虽然还存在某些争议,但逐渐为学界多数人所接受。它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的突破和创新,是新时期文艺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

如何处理与文论传统的关系,是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对传统本身如何认识。有学者提出“三个传统”说,即古代文论传统、西方文论传统和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与时俱进,对古代文论传统中仍有生命力的优秀内容,在变革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使之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也是新时期文艺学观念创新的一大收获。

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在不同情况下一再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之一。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是当代西方文论中最重要、覆盖面最宽、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领域,对中国当代文论确

实发生过很大影响。学界普遍认同,把文化研究引入文学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理论视野,吸纳其他学科、领域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研究作为核心课题,对于当代文论加强对包括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在内的大众文化研究,起着直接、重要的启示作用。将文论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确实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是新时期文艺学观念创新的积极成果之一。

第二,文艺学方法论上的变革、突破与更新,有力地推动了文论观念、话语体系的拓展和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过去之后,对文学研究方法的冷静思考和深入探讨还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文学研究方法上有了更多的突破与创新。更多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被介绍、引进,像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语言学、符号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阐释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人类学、比较诗学、全球化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许多种学说和研究方法被相继引入和应用,标志着文学研究思维模式发生了现代转型,开始以一种更为清醒自觉的姿态寻求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新方法论系统的建立,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文艺学的理论话语,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而且促进了文艺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新时期关于方法论的研讨,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和弱点,后来不时会听到对方法论热的某些批评甚至嘲笑。但是,应当客观公正地指出,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论的研讨和变革,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而深远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改变、拓展、形塑了拨乱反正后那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重构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话语谱系,使他们及后来者有可能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第三,文艺学观念和方法的变革与更新,成为新时期一系列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生成的重要契机和动因,大大丰富了文艺学的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建设。这一时期,学界有批判、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了当代西方的诸种文论思潮、流派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范畴、概念,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比较系统的学科性新著作,催生或初步建构起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修辞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文学叙事学、文学阐释学、文学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已有专著出版,从而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和领地,反过来也促进、深化了文艺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总之,新时期文艺理论所取得的上述巨大成就,

在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步子,为今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40年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列举几点许多学界同仁共同的切身体验。

第一,应当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大发展的根本前提。学界的共识是,包含文艺学方法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文艺学方法论多样化既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是对它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始终,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成就尤其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逐步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

第二,应当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学界开展畅所欲言的学术争鸣和讨论提供良好的精神文化环境,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回顾过去40年,文艺理论界一个最深切的感受是,开展了贯穿始终、一场接一场的学术争鸣,几乎没有任何中断。这也正是文艺理论能够不断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原因和鲜明特点。正是这种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保证了文艺理论界自由争鸣的顺利开展,也保证了通过争鸣、讨论,推进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讨论争鸣中向前推进,在交往对话中寻求共识,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第三,应当在研究中始终坚持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和规律,这是文艺理论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内生动力。文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上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在回到文艺自身,寻找和研究文艺自身特点、规律的过程中取得的。回溯40年来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学界始终是在围绕着文学本质问题进行再思考、再探索,几乎所有讨论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文学本质问题,向文学本质问题汇集。可以说,这牢牢抓住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形象思维、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深刻反思,就是寻求回归文艺自身的审美本性,从而逐渐走出了单纯政治化的阴影。80年代后期起,对文学形式的多方面研讨,是对以往忽视、贬低形式对文学审美本性的关键作用的纠偏。长期以来,反映论是对文学本质的权威界定。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步

认识到,这个界定对文学本质的概括是不完整的,而且受制于政治工具论;于是开始探讨审美反映论,并进而走向审美意识形态论,这显然是对文学本质更加完整、深入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虽然是跨学科、跨学界的,但是它起步于文学研究,结果又在文艺理论界取得较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新理性精神文论”。它虽然不限于直接界定文学本质,却在实际上用“新人文精神”赋予文学本质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核心,拓宽了文学本质研究的思路。此后,关于“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讨论,重点也不是讨论文学本质问题,但是,学界通过对中西文论资源的全面反思,及如何加以批判地借鉴、吸收的深度研讨,同样涉及了如何全方位把握文学多方面多层次本质系统的、中西话语的不同形态、方式、特点等问题,使人们对文学丰富复杂的系统本质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在21世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文学与文化的界限或者文学的边界问题是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直接关乎文学的审美本质是否依然有效的关键点。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文学“与时俱进”的动态本质的新思考。即使近年“强制阐释论”的讨论,涉及问题很多、很广,但是,它重点是对当代西方文论远离文学和文本的“去文学化”倾向的反思和批判。40年来,老中青几代的学者都在不倦地探讨各种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并没有有意识地集中于文学本质问题,但是,回过头来看,确实确实紧紧扣住了文学本质问题,而且认识步步深化。这一方面表明,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始终抓住了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这个核心问题,这条主线十分清晰、很少偏离;另一方面也证明,只有尊重文艺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文艺理论研究才能不断突破、创新,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第四,应当坚持开放的心态,以文明互鉴的大视野面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理论创新,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研究方法、理论观念、概念话语和学科形态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清晰地看到,贯穿40年一系列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就是中国新老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总体上说,西方文论的引进,在推进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上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作用,我们应当承认,其中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是,学界对此认识上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整个新时期中国文论走的是跟着西方文论亦步亦趋乃至“全盘西化”的路子。这个看法显然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新时期文论发展的实际。这里,关键在于如何辩证看待和正确处理中西文论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中西文论看成截然对

立、水火不容的两极。它们之间当然有矛盾、对立和冲突,但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知识体系角度看,它们之间又有共同、相通之处,因而可以对话、交流和沟通。如果我们站得更高,以开放的心态和文明互鉴的视野来看待中西文论的关系,就有可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就会发现,中国百年来现当代美学文论新传统的形成,以及整个新时期文艺学的创新发展,都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包括局部矛盾冲突),互相借鉴、吸收、融合的过程。

的确,从现象上看,40年来,我们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借鉴和吸收一直进行着,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很多已经转化进入我们当代文论的理论、知识谱系。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借鉴吸收,并不是单方面的亦步亦趋或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语境,有选择、有批判、有目的地学习借鉴和创造性地吸收转化,是中西互鉴、“西化”与“化西”既博弈又融合的辩证过程。我们前面说到的一系列文艺理论创新成果,无不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西方文论盲目崇拜、不加辨析地全盘吸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虽然不占主流,但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以正确引导。比如对当代中国文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主导方面的积极影响,更应该对其容易被忽视的消极影响加以细致辨析和深入批判,以便将其消极影响克服。同样,中国古代文论也始终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它的内在精神和血脉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当代文艺学之中,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回应,指出了新时期继承、改造、转化、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正确路径。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的学者们已经在扎实而有序地进行着这个“现代转换”的大工程,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实绩。

关于中西学术的互动、互促,王国维有过精彩之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或许也适合于中西文论的互鉴、互动、互促。

总之,面对中西方两个文论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开放的心态和文明互鉴的大视野,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努力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不断进行有批判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融入我们当下的文艺学建设和发展之中。

■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约18000字